

論新化文國中  
篇論序

流古萬河江廢不



中國文化新論——序論篇  
不廢江河萬古流

70.9.0500

中華民國七十年九月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二月第六次印行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R.O.C.

定價：新臺幣 一二〇元精裝  
七〇元平裝

總主編 劉 岱  
本冊作者 劉 岱  
發行人 王 必 成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61號  
電話：3620137·6418662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ISBN 957-08-0260-x

· A 63001-1 ·

# 中國文化新論 序

王惕吾

「中國文化是什麼？」這是現在一般人常常提出的一個問題，也是社會上常常討論的一個問題。

無論是倡導文化復興、推行文化建設、促進社會的現代化、或培養下一代中國人的民族文化意識和情操，都與對中國文化全面的認識和了解，有著密切

而重要的關係。

雖然我們生活在中國文化的環境中，文化與生命原是不可分的一體，但八千年來先民筭路藍縷，創造傳承而形成的中國文化，源遠流長，富麗多采，加以歷代典籍繁多，一般人總難有一個完整的概念。尤其對於大眾而言，我們更缺乏一部適宜的認識中國文化的現代讀物。

這一部「中國文化新論」叢書就是爲了彌補這項缺憾而編撰。近百位學有專精的年輕學者接受邀請，分就根源、學術、思想、制度、社會、經濟、

文學、藝術、科技、宗教禮俗等方面，以深入淺出的文筆，客觀系統的探討，呈現中國文化永大永久的內涵，希望能藉此起始，提供一部豐富新穎、流暢可讀的中國文化史叢書。「珍裘以衆腋成溫，廣廈以羣材合構」可以用來說明這部〔中國文化新論〕編撰的歷程。

聯合報創刊已屆三十周年，本於「取之社會，用之社會」之義，成立了「文化基金會」；〔中國文化新論〕即由「文化基金會」支助出版，正是爲宏揚我國文化、參與文化建設提供的一份貢獻。

〔中國文化新論〕編輯委員會

總主編：劉岱

編輯委員：杜正勝、林慶彰、林載爵、邢義田、洪萬生、郭繼生、

黃俊傑、劉石吉、劉增貴、蔡英俊、鄭欽仁、藍吉富。

助理編輯：方清河、沈松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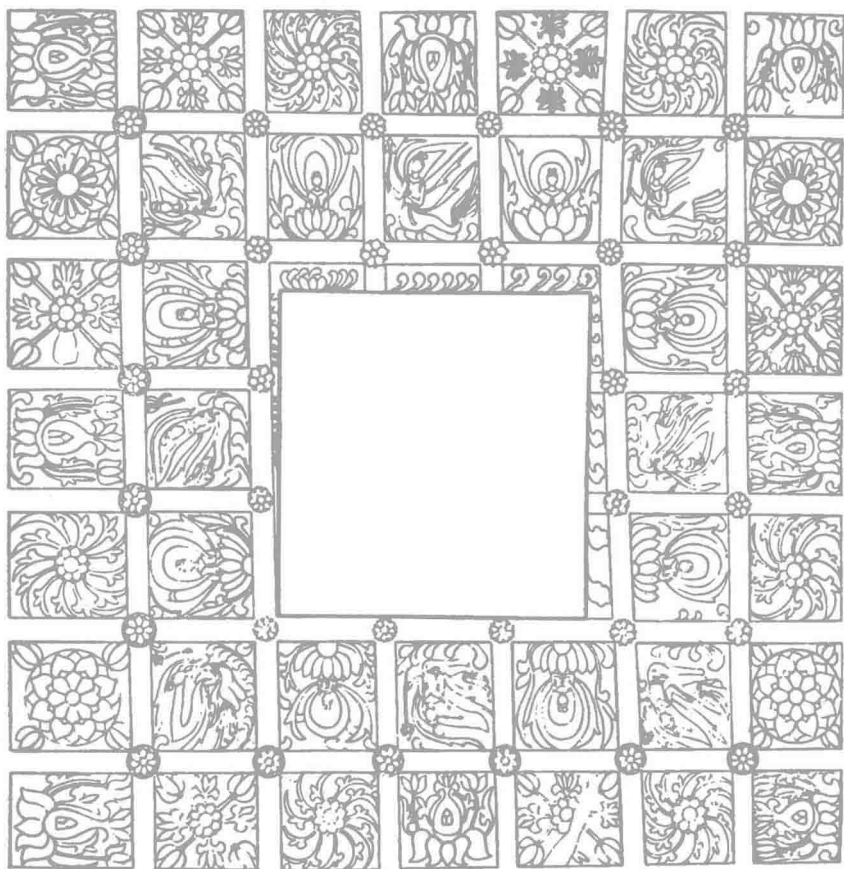
撰述人：丁敏、王文進、王孝廉、王明珂、王明蓀、王國良、

王霜媚、王鎮華、王耀庭、方清河、石守謙、朱惠良、

朱鴻、江淑玲、何啓民、何湘妃、吳克、吳炎塗、

吳璧雍、呂正惠、呂興昌、宋淑萍、杜正勝、李今芸、  
李弘祺、李孝悌、李東華、李豐楙、周雲錦、林載爵、  
林慶彰、林聰舜、林麗月、邢義田、徐秉愉、孫鐵剛、  
高明士、洪安全、洪萬生、洪德先、耿立羣、張火慶、  
張永堂、張哲郎、張榮芳、張瑞德、張端穗、曹淑娟、  
梁庚堯、莊吉發、郭維生、陳良佐、陳芳英、陳芳妹、  
陳郁夫、陳國棟、陳勝崑、陳弱水、陳慈玉、陳進傳、  
陳擎光、曾昭旭、黃克武、黃沛榮、黃俊傑、黃寬重、  
黃耀能、楊宿珍、楊惠南、葛紹歐、魯經邦、劉石吉、  
劉君燦、劉良佑、劉昭民、劉紀曜、劉超驊、劉增貴、  
蔡明田、蔡玫芬、蔡英文、蔡英俊、蔡學海、鄧淑蘋、  
鄭欽仁、盧建榮、賴瑛瑛、戴晉新、顏娟英、藍吉富、  
龔鵬程。

不廢江河萬古流



序論篇 中國文化新論



## 目錄

時代環境與歷史研究	一
近百年來的歷史背景與歷史意識	六
文化定義淺釋	一五
一些錯誤歷史概念的澄清	二三
文化史教育與文化建設	五七
中國文化史編撰的新嘗試	六三
附錄：〔中國文化新論〕總目	

## 時代環境與歷史研究

每一代人回顧歷史，都各有其獨特的時代背景。因此，每一代人歷史意識的形成、史觀的建立，都往往不能免除自己時代環境的影響。我們研究思想史，常常注意每一個時代的歷史思想，希望在這一代的歷史意識裏，去探尋其對世事人生所抱持的態度，其原因也在於此。就史學的理想境界而言，歷史研究是一種存實求真，以明察人類各文化社會興衰流變的因果，及其發展脈絡的學問；然而，無可否認的，每一代人的時代環境，卻也深深的影響着

這一代人對歷史的態度和情感，更進而影響了他們對歷史的研究和解釋。

從中西史學的淵源發展來看，這種時代環境、歷史意識、以及歷史研究間的交互影響，並不必然是一個不好的現象。研究歷史的最高鵠的，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而每一代人自己的歷史經驗，尤其是在一個急劇變遷的社會中，或重重憂患的時代裏，也常使這一代人對歷史的認識與研究，有着更新穎的眼光，和更深遠的透視，因而能提出前人所不曾提出過的問題，見到前人所不曾見到過的意義。在中西史學史上，超絕一代的史學大師，千古不朽的史學名作，也正多出現於這種憂患殷重的時代裏。其實，我們也可以說，史學原都是孕育誕生在歷史憂患之中。在〔史記〕的「太史公自序」裏，司馬遷對孔子修〔春秋〕的時代背景，便曾有一段很好的說明：

上大壺遂曰：昔者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

從以上這一段記述，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出，孔子的修《春秋》，與他當時的時代背景，有着密切的關係。感時而作史，這正是一個顯明的例子。從中國上古史的發展來看，春秋時代確是一個急劇動變、憂患重重的時代。在政治上，由於周室衰微，王權沒落，擁有廣大封疆的諸侯，相繼崛起，擴張領土，蓄養軍備，以武力稱霸於世；而各國的巨室，也僭越權力，篡弒相仍，在在都破壞了傳統的國家政治秩序和禮制規範。所以，「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而且，在文獻方面，周室東遷後，王室的典籍已經殘缺不全，諸侯各國的春秋史乘，更往往因國亡而失絕。因此，春秋一代，不僅在政治社會上是一個急劇動變的時代，而且，由於文獻的散失，歷史的發展流變更面臨着失實亡真的危險。所以，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又說：「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乃稱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曆數，籍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感世事之激變，慮文獻之散亡，孔子的修《春秋》，真可說是意義深遠的千秋事業了。

在西方，史學的濫觴也與歷史憂患息息相關。紀元前第五世紀，與我國的春秋時代幾乎

同一個時期裏，西方的古希臘世界也經歷了一場大變局。在第五世紀的初葉，希臘曾經兩度遭受到東方波斯帝國大軍的入侵；而第五世紀的後半葉，卻又是希臘各城邦間將近三十年的連綿內戰。在兩次波斯大軍的入侵中，希臘人能以少勝多，用自由城邦的精神擊敗了奴役暴力，可說是希臘文化的一場生死存亡的搏鬥；而三十年的帕羅奔尼撒戰爭，卻是希臘城邦間霸權的爭奪，背棄了希臘文化中道的理想，而終將希臘世界帶到了衰微的邊緣。因此，在西曆紀元前的第五世紀，希臘也出現了兩位大史學家：希羅多德（Herodotus）和修西底德斯（Thucydides）。前者記述了波希戰爭中，希臘人誓死維護自由的英勇事蹟；後者則對希臘各城邦間權力的衝突，以及帕羅奔尼撒戰爭發展的脈絡，作了精闢的分析。

以上的說明，僅以中西史學早期的形成和發展為限。其實，歷代的大史學家，幾乎無不受到時代環境的影響和激勵。感時而著史的例子，真是不勝枚舉。

不過，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種時代環境的影響，如果缺乏嚴謹的史學方法，公正的治史態度，以及精深的歷史研究作基礎，卻也往往會造成嚴重的歷史偏見，反而不能認識歷史的真象。在近代文化的急劇轉變中，由於價值觀念的不同，對事物評判的標準也因而相異，這種因時代環境所造成的歷史偏見，更容易產生，使我們不僅不能再領悟和感受前人的思想和情操，也無法正確的去判斷歷史上各種典章制度的政治功能，或禮儀規範的社會意

義。近百年來，中國人的歷史意識裏，便處處呈現出這種現象；這是大家所熟知的事，我們在下文中也將有更詳細的討論。在西方，十八世紀的啓蒙運動，由於思想文化的轉變，也有同樣的現象發生。而且，這不僅在一般人的意識上是如此，即是在著名的史學家的思想中，也不能全然避免。譬如，十八世紀西方兩位著名史學家伏爾泰（Voltaire）和吉朋（Edward Gibbon），都是西方史學史上卓然有成的一代大師，然而，他們卻也不能免除由啓蒙時代的思想情感和智識態度所形成的歷史偏見。所以，自十八世紀末期德國的赫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到二十世紀英國的柯靈悟（R. G. Collingwood），都一再指出啓蒙運動所造成的歷史偏見及其影響。柯靈悟更索性把十八世紀啓蒙運動的史學思想，認為是一種爭辯性的、違反歷史的思想，而不是研究歷史所應有的正確態度。中國近百年來的歷史意識，尤其是二十世紀初葉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思想，也明顯的是抱持着一種爭辯的立場，而缺乏歷史的同情了解。柯靈悟此一論點，是值得研究中國近代史學思想的人反覆思考的。

無可否認的，近百年來，中國文化遭逢了一個憂患深重的時代，同時，這也是中國文化本身在急劇變遷的一個時代。近百年來的歷史環境，無疑的在深深影響着近代中國人的歷史意識。一方面，這一個兩千年來中國歷史的大變局，激勵了新的歷史研究，提出新問題，探

尋新意義。然而，在另一方面，近百年來的內憂外患，西潮的激盪，文化的劇變，也使我們產生了許多歷史的錯覺。

## 近百年來的歷史背景與歷史意識

自從清季末葉以來，在這一百多年的歷史過程中，古老的中國文化遭逢了一次亙古未有的雙重危機。從外在的世界環境看，這正是近代西方國家的政治、軍事、經濟、科技等力量的蓬勃興起、迅速擴張的時代；而這西方勢力的東來，又恰巧是中國的滿清王朝衰替沒落的時侯。西方勢力的入侵，和滿清帝國傾覆前後所造成的昏庸腐敗、紛亂錯雜的勢局，交織成近代中國政治社會史上一頁黯淡而令人悲憤的歷史。在另一方面，從近代中國人內在的思想意識看，這一段的歷史經驗，更在中國人的心靈深處，留下了難以忘卻的沉痛創傷。在歷史上，中華民族原是一個歷經憂患的民族，而中華民族所創造出的文化世界，也並不是一個生長在歷史暖房中的文化世界。在過去，中國也曾屢次經受外來勢力的侵擾，然而，中國人——有志節的中國文化人——對中國文化的生命和價值，卻從未失落過信心。相反的，每當中國文化社會遭逢侵擾和危難的時候，總有一些堅毅不拔的志士仁人，服膺着多難興邦和生於憂患的傳統歷史信念，在橫逆困危的環境裏，努力重建國家的政治秩序，維護社會的禮俗

規範，傳遞先人的學術智識，綿延民族的文化生命。然而，十九世紀中葉到二十世紀初葉的一場歷史變局，卻在許多中國人之間，尤其是許多近代中國知識分子之間，造成了對民族文化信心的動搖和失落。

西方列強勢力東來所構成的危機，畢竟是威脅着中國文化世界的外在力量，而且，外在的危機，隨着整個世界形勢的消長流變，會漸次在歷史發展演變的過程中消失。我們以近代西方國家勢力的東漸爲例。葡萄牙人在十六世紀初葉，從非洲沿岸，通過印度洋，而直到南中國海域所建立的海上帝國，實際上到十六世紀末葉已逐漸走向沒落。在同一時期內崛起的西班牙王朝，從斐迪南 (Ferdinand) 和依薩伯拉 (Isabella) 到菲利普二世 (Philip II)，不僅武力雄視歐洲，而海外領土的擴張，更自新大陸直到東南亞的菲律賓羣島。然而，到十七世紀中葉時，西班牙王朝也已經明顯的走上衰替的道路。在十七、十八世紀以後相繼興起的荷蘭、英、法、德、意等西歐國家，到二十世紀的前半葉，經過了兩次歐戰的烽火劫禍，隨着亞、非和中東舊殖民地及附庸領土的喪失，也都漸次在世界舞臺上退居於次要的地位。半世紀前日不沒落的大英帝國，今天已岌岌不保英國王室傳統領土的完整。卽以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崛起的美、蘇兩大強國而言，由於三十年來整個世界政治形勢和經濟結構的演變，在戰後國際權力上所形成的兩極形勢已不復存在。而且，在蘇俄的共產主義帝國內，東歐附庸



國家的人民，在南斯拉夫、在匈牙利、在捷克斯拉夫、在波蘭，爭取國家獨立、自由人權的浪潮，已洶湧不可抗拒；而蘇俄內部少數民族及反共鬥士們的不滿情緒，更是蘇俄帝國終將毀滅的徵兆。因此，我們從近代世界歷史形勢的消長流變看，一百多年來中國文化世界所面對的外在危機，畢竟都終會在整個歷史發展過程中消失。何況，多難興邦，對於一個尚未失落民族文化信心的國家，外來的憂患，卻更能激發其文化的創造力，而促成民族的復興。

然而，一個民族若對本身文化喪失信心，因為惑於一時的時代環境的影響，而產生歷史的偏見與錯覺，以致於對自己民族文化的真實面貌及其內在的精神，不能再有完整的、不偏不倚的認識和領悟，這樣便容易造成了歷史意識的錯亂。而歷史意識卻又正是影響每一代人思想和行爲的巨大力量。因此，錯亂的歷史意識，往往會形成思想上和行爲上的狂風驟雨，把一個文化世界的事物摧殘得花果飄零。

十九世紀的歷史經驗，像是一個濃重的陰影，籠罩着近代中國人的心靈。堅船利砲的震盪，割地賠款的屈辱，亡國滅種的憂憤，在多少中國人的心靈上鑄下了一個糾纏難解的情結——對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與意義的懷疑和批評。近代中國的政治史和思想史，幾乎與這一個歷史意識問題不可分割。從清末自強運動的初期，到民國初年的中西文化論戰，一直到近三十年中國大陸上的一場文化浩劫，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出近代中國人這種歷史意識的形成與發